

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 知识理性、行动偏离与优化策略^①

楚旋¹, 吁婷¹, 李漫红²

(1.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36; 2.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42)

摘要: 一流学科的核心是知识, 一流学科政策的知识理性是政策核心, 以理性行动表达知识理性是一流学科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一流学科政策的知识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在于追求真理、知识创新, 工具理性在于依托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来培养人才, 创新科技, 优化高等教育体系。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 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一流学科政策的成效。在知识场域内, 应以知识理性为核心, 建立完善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机制, 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在现实情境下, 一流学科政策执行往往偏离知识理性, 产生价值偏离、知识不平等、知识功利化、执行者“孤立”、价值动力失衡等问题, 需要通过理清权力关系、创新评价模式、共建学科共识、建设共同体网络等策略来优化一流学科政策, 提高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效能。

关键词: 一流学科; 学科政策; 知识理性; 执行偏离; 执行效能

中图分类号: G40-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485(2024)12-0048-09

DOI: 10.16697/j.1674-5485.2024.12.006

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全面推动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科政策致力于促进学科内涵提升, 推动学科特色发展, 加快优势学科快速发展, 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尽管多年来我国一流学科政策执行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往往偏离学科的知识理性, 使一流学科一度陷入“工具化”倾向。由于过度关注效

收稿日期: 2024-02-24

①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统筹策略”(BIA230208); 辽宁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2024LDZX020)。

作者简介: 楚旋, 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博士; 吁婷, 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

通讯作者: 李漫红, 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院长, 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博士。

益效率，学科发展偏离了对真理和知识创新的理性追求，资源无序竞争打破了学科协同，严重影响一流学科建设成效。

一、一流学科政策知识理性的概念溯源与行动表达

一流学科的核心是知识，知识经过专门化、系统化的发展而塑造成学科组织，学科知识在社会中以学科组织为客观形态。一流学科政策的知识理性是政策的核心，通过政策相关者的理性行动予以表达。

（一）知识理性是一流学科政策的核心

学界对学科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普遍认同知识、组织是一流学科的重要构成，知识是学科的核心。

1. 知识是一流学科的核心

有研究者认为，学科主要表现为一种规训制度，其主要体现了规训制度、操控体系、操控策略。学科包含知识和组织两种形态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强调知识和组织。^[1]有研究者认为，学科是知识发展成熟的产物，是专门的知识体系，把一门知识称为一门学科，需要严格和具认受性的蕴义过程。^[2]

有研究者认为，学科是根据实践的不同性质划分成各种知识门类，是围绕知识分化产生的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学科可理解为围绕知识而形成的日趋专门化、科学化的组织方式，通过熏陶、训练、规训而形成的独立的组织建制。^[3]也有研究者认为，学科是知识的存在形态，即作为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存在形态，具有知识形态的学科、知识的规训制度、知识的组织建制三个层面含义。^[4]还有研究者认为，学科的核心是知识，是人为划分的知识系统。^[5]

综上所述，我们认同学科是知识与组织的共振产物，具有知识与组织的二元属性以及从

局部到整体、从无界到有限、从碎片到完整、从无形到有形的状态表征^[6]，知识是学科的根本，是学科的内在核心。

2. 一流学科政策的知识理性

在哲学层面，“理性”是指某种行为或者信念的基础或根据，知识理性主要是指认知层面上的确定性、明晰性和可言说性。^[7]知识理性是属“人”的，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也是属“社会”的，是一种精神活动，包括一整套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8]

学科的知识理性反映学科的关涉者从事学科活动的精神活动，包括规则、习俗、价值等，也反映人依据对待知识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行各种学科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学科的知识理性是客观存在的，体现了人们对于学科知识属性的价值认知。

在一流学科政策中，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都体现着政策相关主体的主观意愿、规训制度与价值偏好，既关涉政策制定主体的理性表达，也关涉政策执行者的理性行动。为此，在一流学科政策中要充分融入、表达知识理性，以知识理性作为一流学科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等行动的理性基础，以知识理性来表达学科相关者对待知识的态度和价值观。

（二）价值与工具：一流学科政策知识理性的行动表达

一流学科政策知识理性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中的价值是主观欲求、意愿、信念、意向，是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工具理性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行动。一流学科政策的价值理性体现在学科内涵及学科精神层面，一流学科政策的工具理性则体现在学科成果及学科实践层面。

1. 一流学科政策的价值理性

一流学科政策的核心价值理性在于学术精神的传承、学科文化的发展及学科知识生产与

创新。一是传承学术精神。有学者认为，学科源于学术，当学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呈现专业化趋势后，即形成了学科，学术是学科的灵魂，没有学术就没有学科，学科政策的价值理性应通过学术精神予以彰显，学术精神包括纯粹的理论精神和以知识为力量的技术精神。^[9]一流学科政策的价值理性在于彰显追求真理、真知的学术精神。二是发展学科文化。学科文化包括知识传统、思想范畴、相应的行为准则及对理论、方法、技术和问题的信念，甚至包括生活方式和偶像崇拜。^[10]⁸⁷学科文化是学科在运行和演进过程中基于自身知识、学术特点的自由或者人为赋予的价值与规范体系。^[11]学科文化由学科价值观、思维方式、规范、话语系统、学科偶像等组成的完整体系。^[12]学科文化根植于学科，决定了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及组织系统与运行规则，是一系列被认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其价值理性在于形成“集体交流、竞争和宽容、合作”的学科文化。三是创新发展知识。一流学科政策的价值理性在于推动人类对未知永无止境的探索，也在于对知识的无限追求及对真理、规律的无限渴望。一流学科政策在于推动传承已有的知识，向学习者传播一流学科知识，通过学术研究发现真理、探究规律、创新知识。

2. 一流学科政策的工具理性

一流学科政策的工具理性源于学科知识理性的应用与实践，是体现在培育创新人才、提升学科竞争力、服务国家社会需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方面的理性行动。

一流学科政策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一流学科政策推动一流学科以知识生产与创新为追求，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与国家需求紧密融合，探索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原始创新知识和理论，研究和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重大

实践技能问题。一流学科政策以一流学科为引领，辐射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促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优化，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13]，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二、基于知识理性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是决定学科政策成效的重要环节，学科政策执行是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构建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策执行相关主体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知识场域

教育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是知识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复杂性行动，行动情况直接决定了一流学科政策的执行成效。

场域是一个争夺资源的空间，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的位置。知识作为生成元而孕生学科，学科是序列化、组织化和逻辑化的知识。^[14]知识场域是有意识的，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度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原则发生冲突。^[15]¹⁷⁶⁻¹⁷⁸学科专业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业化，是人类对已有知识范畴的一种组织和管理状态。^[10]³⁴在知识场域中的行动者，致力于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的权力与利益。我们借用场域理论将学科视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创新场域，分析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关系及其行动策略。

（二）知识场域下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我们以知识场域为背景，以知识理性为核心，建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在学科知识场域中，知识是核心，最接近知识的部分是规训制度。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制度化发

展，在知识与规训制度外部，由权力、合作、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团队、组织和文化。知识、规训制度为内核，团队、组织和文化为外核，共同构成了学科知识系统。

在学科知识系统外部是一流学科政策行动主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我们将其称为学科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三个基本元素。一流学科政策行动者包括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行动者都有自身的利益偏好，并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通过控制资源与他人建立联系。

在知识场域中，行动者的信念与行动交织形成完整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监督、评价等方式对高校政策执行行动产生影响，以实现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通过委托代理、政策引导等方式激发市场、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市场通过供给、需求的不断变化来影响高校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社会通过反馈性评价来影响高校的一流学科政策执行。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机制的网络中，知识理性是知识系统的核心，知识创新、真理探索是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内在动力，是相对稳定的。政府、市场、社会是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外部动力，追求学科知识产生的溢出价值是易受其他诸要素影响的。只有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内核与外核协同发力，才能够保证一流学科政策有效执行。

三、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知识理性偏离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要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才能确保一流学科政策的有效执行。然而，在现实中一流学科政策常常过度强调学科的工具理性，产生了学科治理行动失范等一系列知识理性偏离问题。

(一) 政策制定主体过度崇尚工具理性导致行动失范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政府出台政策法

规文件对一流学科实行引导和管理，通过政策制定、信息服务和资源分配来推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一是一流学科政策过于突出工具理性，强调目标导向，在“双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事务性、目标性，将国家目标与价值选择性施加给学校，而对这些目标如何与学科本身运行协调及学科自身的知识创新与传承关注不够。二是一流学科政策对急需学科的强制性“促生长”破坏了学科生态平衡，倾向性资源配置影响了学科有序竞争和自由发展。在知识场域内，政府过于强调行政权力下的资源分配，这加深了高校对权力的依赖，降低了高校学科自主发展动力和积极性。三是政策制定者对多元主体的协调与合作观照不够。管理的“碎片化”也会影响学科政策的执行，严重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16]一流学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忽视了市场对执行者行动的影响，从而导致行政、市场、学术三种力量失去平衡。“自上而下”政策执行模式过于关注工具理性行动，忽视以知识为内核的学科自主发展逻辑，导致了大学学科建设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影响了一流学科知识系统的建设，从而抑制知识的自主创新与发展。

(二) 政策资源分配“非正义”加剧知识的不平等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通过制定分配资源的规则来影响高校行为，这种治理模式强调了效率和效益，但损害了高校及其相关行动者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忽视了公平与正义。有学者指出，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控制所有的资源，都没有资格共同决定如何把它们施舍出去。如果每个人对该分配中所拥有的、持有的都是有资格的，那么分配就是正义的。^[17]一流学科政策资源配置的行政化，造成了一流学科资源分配的非正义、无规则，导致学科治理失范，加剧了不同

学科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制约了非一流学科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在客观上，这种资源分配的非正义造成了知识的等级化，由于知识的自由和解放是一切自由和解放的终极之道^[18]，因而资源分配的工具性和非正义性加剧了知识的不平等。

（三）忽视学科制度精神导致知识“功利主义”

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与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学科制度精神是学科行为准则体系，是学科知识理性的价值表达，学科制度精神蕴藏着人类智慧活动史所蕴含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19] 尽管一流学科政策执行强调学科制度结构，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学科是一个在自然成长中形成的学术群落，除了追求“应用知识”以外，还对真理有着不懈的追求，大学的理想蕴含在学科制度的精神之中。正如布鲁姆所说，他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周围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他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想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20] 大学是为了保障纯粹理性存在合理性的最后神殿，也有能力保存伟大思想、行为和任务以对抗流俗，并使不竭的批判怀疑精神得以滋养。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过多关注政策的“工具理性”，从而深陷“利己主义”的泥潭，培养出更多“精致利己主义者”。一旦将人才培养与就业画等号，将学术研究与经济产出画等号，并以此作为人才培养和科研评价的唯一手段，那么必然会导致大学学科专业接入产业和市场，产生严重的学科“漂移”等异化现象。^[21] 这些异化现象将使学科发展丧失追求真理的使命感，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

（四）执行行动协调度差导致执行者成为“孤勇者”

教育政策相关议题总是由一系列互补兼容

的价值或需求构成的，同时政策又是一个相当稳定，但可更改的，旨在对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进行协调，从而达到理想状态。^[22] 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最佳状态是不同需求者相互协调。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不同的价值偏好与需求在学科政策执行中被进一步放大，不同主体间为争夺学科发展资源而激化了彼此的竞争关系。在办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激发了高校的资源掠夺和竞争，这种基于“权威与荣誉”的竞争显然无法淡化身份，突出特色。学科治理工具理性强化了各地区与高校对于“现实成效”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使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等见效周期长的学科资源争夺能力弱化。一流学科政策执行忽视了学科源自历史、文化的积累与特色考量，强化了应用转化性强的学科，从而铸造了一种无形的壁垒。由于资源有限，政府、高校都关注竞争忽视合作，过度竞争阻碍了不同区域高校及高校内部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割裂了学科群内部各学科之间本能互动的路径，消弭了对重大现实问题、应用型难题的回应。^[23] 从而导致难以生成高质量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学科结构不完善、学科交叉难以发展、新兴学科难以培育等问题。

（五）目标群体理性共识与集体理性背离导致价值动力失衡

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是一种集体的行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主体必须遵循集体行动的共识原则，即执行者妥协并接受意见，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一旦集体行动由单一主体做出决策，却要求集体成员依照个体理性开展行动，这就涉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背离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囚徒困境。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政策行动者价值离散，导致政策目标群体缺乏明确定位，难以通过学科政策执行使利益实现最优化，难以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概念，也难以

进行统一界定^[24]，这就造成政策行动者对学科知识理性的忽视，对政策理性价值的误读，进而导致行动与原目标不一致。

在整个学科政策执行中，利益分配机制仅局限于入选的学科，难以激发未入选学科的改革和发展动力，一流学科政策尚未产生“罗森塔尔效应”，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由于缺乏积极的、正向的引导，政策制定者难以理解目标群体的理性价值，难以激发群体的期望和活力，这样会阻碍集体有效政策执行行动，难以形成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的生态，影响一流学科高质量发展。

四、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优化策略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要以“知识理性”为内核，形成以“知识理性”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重视学科知识理性、共享知识、创新一流学科评价等策略提升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效能。

(一) 优化权力关系，建立以“知识理性”为内核的治理体系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存在多种权力关系交错纵横，必须优化权力关系，完善治理体系。政府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当有效配置权力关系，加强宏观统筹和战略布局，从政策上指导高校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学科建设，引导高校以学科知识理性为价值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合理调整学科布局。

进一步提升学科知识理性意识，以知识理性为原则，多主体对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和评价。一是提升政策目标群体对学科知识理性的认识，增强目标群体对学科文化、学术精神及知识创新的重视，提高知识创新的能力。二是设置以“知识理性”为基础的评价标准。改变以往工具理性主导的评价标准，增加有关学术精神、知识创新与传承等价值理性的评价

标准，设立常态化的监测体系，注重考核学科发展度及知识创新度。三是形成以“知识理性”为内核的第三方评价体系。鼓励以“知识理性”为内核组建第三方评价机构，重视学科知识创新与学术探索。同时，兼顾工具理性，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实现价值与工具兼顾，理想与现实统一。

(二) 开展政策“目标-效益”评价，促进政策资源合理分配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资源分配的“不正义”导致了学科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学科知识等级化。我们应以“知识理性”为基础，创新一流学科评价系统，采用有效的评价技术，提高学科评价质量。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可以创新学科评价思路，采取“目标-效益”评价模式。学科评价机构应进一步细化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目标，设置明确的量化执行标准，保证政策执行行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25]所谓“目标”评价，即对高校学科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和分析，依据国家和各地的发展需求，结合学科自身发展特征与定位，将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分解成可操作的工作目标，既包括科研成果转化、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等工具理性，也包括学科的知识创新、学术探索等价值理性。通过关键绩效评价明确学科发展需要集中力量解决的问题，指明一组相关联的关键实践。所谓“效益”评价，即依据所投入的成本与所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评价，必须考虑到每个学科由于历史、文化、区位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着名望、财富、权力等差异。通过“目标-效益”评价模式对一流学科成效进行有效评价，提高一流学科评价水平，促进政策资源合理分配。

(三) 重视学科知识理性，达成一流学科价值共识

学科的发展不能离开知识的生产，学科是

知识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知识生产的外延过程。^[26] 一流学科政策应当以知识生产为核心，不仅要强调学科的经济性价值和实用性价值，还要强调知识生产的理性价值。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和条件，是一种精神追求，知识本身即是目的。^[27] 知识的经济价值具有时代性，而追求自由、真理价值和文明价值是永恒不变的，要重视学科精神。

在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无论是政府部门、高校还是学术研究者，所有相关政策执行者都应当重视学科的知识理性，重视知识的生产、传承与创新，不应将一流学科的发展禁锢于经济价值的泥潭中，执拗于学科的“工具理性”，应加强一流学科的知识理性宣导，引导和推动行动者们形成学科价值共识，回归一流学科的本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理、价值与规律的探索，推动一流学科高质量发展。

（四）建立知识大市场，推动政策执行者协同行动

资源争夺与资源分配是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关键。过往的学科声望、地位、成就会造成资源争夺的无序性与资源分配的非正义性，加剧了高校的学术竞争与分化，制约了政策执行者的协同行动。解决资源争夺的无序与不正义的关键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全国学科“大市场”营造公开、和谐的一流学科发展环境，打通不同区域的“学科信息孤岛”，推动国内跨区域的学科集群建设，促进交叉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发展。我们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AI技术建立“需求端—供给端—服务端”三个端口融合的学科大数据系统服务平台，第一端为“问题”需求端，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为主，以“项目”、“问题”或“知识”为依托，根据所涉类型、领域进行分类。第二端为知识供给端，以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服务为主，以提供科学研究和创新知识为目的，根据

学科类型与特色等进行学科服务机构分类。第三端为服务平台端，以第三方机构、风险投资机构 and 运营管理机构等为主，以提供第三方服务为目的，根据不同服务职能类型分类。

学科“大市场”可以实现学科知识信息大数据化，通过AI智能技术进行匹配，推动学科团队合作、科研成果转化等。学科“大市场”可以形成多元学科智能化合作系统，以一流学科为主导，其他学科为辅助，推动学科政策执行者的创新合作与协同发展，形成贯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学科知识创新体系。

（五）重视学术沟通价值，建立学科共同体网络

知识的生产与创新需要团队的沟通与合作。在文化层面，人类的相互沟通不只是以文化资料为媒介，在沟通的过程中，也会传递和更新文化的知识。^[15] 沟通与合作是知识传递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是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关键。学科形态已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再向超学科知识生产共同体范式发展。超学科知识生产下就要强调不同学科和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构建一种学科沟通的“语言范式”，打造超学科学术规则，形成超学科学术共同体。^[28] 通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来促进和加强一流学科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与合作。首先，加快建立各级各类的学术共同体网络，建立同学科、跨学科的学科共同体联盟，设置学术共同体网络的管理机构，建成完整的数据信息系统。其次，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基金，为学术共同体的深度合作提供经费保障。再次，加强身份认同与职责定位。身份认同和个体责任感，是“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一种方式”^[29]，通过名誉奖励、称号认定等方式为学科共同体成员提供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学科共同体发展。

总之，学科的核心是知识，推动知识生产和创新是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行动逻辑，知识

理性以一流学科政策执行的行动予以表达。一流学科政策执行者应深刻认识知识理性对于一流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既要重视一流学科在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解决社会重要问题等方面的工具理性,还要重视一流学科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真理探寻等方面的价值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进而提高一流学科政策执行效能,加速推动一流学科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 徐辉, 郑继伟,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07.
- [2] 周光礼, 武建鑫.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1): 65-73.
- [3] 杨天平, 薛长风. 基于学科属性的大学学科治理[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7): 18-25.
- [4] 张德祥, 王晓玲. 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双一流”建设[J]. 江苏高教, 2019(4): 1-8.
- [5] 刘国瑞. 关于高等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再认识[J]. 大学与学科, 2021, 2(1): 72-81.
- [6] 赵哲. 知识与组织视域下的大学学科建设困境及有效治理: 以地方医科大学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9): 27-34.
- [7] 高秉江. 毕达哥拉斯对西方知识理性的奠基作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22(9): 11-14.
- [8] 周昌忠. 西方思想史上的知识理性历程[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23(1): 99-103.
- [9] 袁振国. 学术是学科的灵魂: 大学变革的历史轨迹与启示之三[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18): 29-32.
- [10] 伯顿·R. 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 徐辉, 殷企平, 等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 [11] 吴叶林, 崔延强. 基于学科文化创新的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探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 38(5): 89-97.
- [12] 韩文瑜, 梅士伟. 把握学科规律 培育学科文化 促进学科发展[J]. 中国高等教育, 2011(7): 22-24.
- [13] 卢晓中, 王洋. 论“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向度: 基于“场域-行动”政策分析的视角[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12): 32-42.
- [14] 马廷奇, 郑政捷. 生态视域下一流学科的成长逻辑与建设方略[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1): 83-92.
- [15] 杨善华,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6] 张金福, 吴倩. 政府管理“碎片化”对大学学科建设的影响及其治理[J]. 中国高教研究, 2012(7): 30-34.
- [17] 诺奇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 姚大志,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79-181.
- [18] 叶赋桂. 高等教育公平: 人的平等和知识的平等[J]. 北京教育(高教), 2021(1): 16-22.
- [19] 方文. 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2-13.
- [20] 布鲁姆.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 缪青, 宋丽娜,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65.
- [21] 王贺元, 王伟宜. 就业视野下的“学科专业漂移”与高校学科专业调整[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59-165.
- [22] GREEN T F. Policy questions: a conceptual study[J].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1994, 2: 7.
- [23] 殷忠勇. 从学科走出学科: 知识生产与知识政策视域下学科群建设的逻辑、困境与策略[J]. 江苏高教, 2020(10): 49-54.
- [24] 檀慧玲, 谢予涵. 教育政策执行视角下“双一流”建设实施的思考[J]. 北京教育(高教), 2016(12): 14-17.
- [25] 刘阳. 陕西省高校“双一流”建设政策执行研究: 以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分析框架[J]. 中国市场, 2022(1): 97-99.

- [26] 瞿振元.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9): 7-11.
- [27] 纽曼. 大学的理想: 节本[M]. 徐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3.
- [28] 陈亮, 商一杰. 大学超学科研究: 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现实挑战[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43-54.
- [29] 比彻, 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6-58.
- (责任编辑: 李作章)

Knowledge Rationality, Action Devi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CHU Xuan¹, YU Ting¹, LI Manhong²

(1.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2.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Liaoning 110142)

Abstract: The core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lies in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rationality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is the policy core. Expressing knowledge rationality through rational actions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mpose knowledge rationality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Value rationality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whil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lie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to cultivate talents, innovate technology, and optimize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ces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a sound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first-class disciplinary polic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core of knowledge rationality,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In rea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often deviates from knowledge rationality, 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value deviation, knowledge inequality, knowledge utilitarianism, "isolation" of implementers, and imbalance of value dynamic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first-class discipline policies and impro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by clarifying power relations, innovating evaluation models, building consensus among disciplines, and constructing community networks.

Keywords: first-class discipline; discipline policy; knowledge rationality; execution deviation;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